

祝嘉著

書學論集



书 学 论 集

祝 嘉

金陵书画社

书 学 论 集

祝 嘉

金陵书画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兴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2.5 字数 310,000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1,000册

书号：10234·005 定价：1.48元

责任编辑 缪泳禾

目 录

书法源流	1
《石鼓文》研究	31
论“汉三颂”	55
论《曹全碑》	71
谈《开母庙石阙铭》	84
谈《禅国山碑》	101
论《天发神谶碑》	113
怎样学《兰亭序》	131
论“二爨”	157
论《六十人造像》	179
《霍扬碑》研究	199
论“南北二铭”	224
郑道昭及其“云峰石刻”	242
论《龙门二十品》	294
谈唐碑	320
谈行书	333
书法初步	345
悬臂论	374
附：论书十二绝句 附浅说	380

书 法 源 流

绪 论

书法与文字的关系，好象毛之与皮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傅”，没有文字是不会有关书法的。我国之有文字，究竟起于何时，尚难确定。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、钟鼎文，并非最古的文字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上载管仲对齐桓公说：“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识者十有二焉。”《韩诗外传》上也说：“孔子升泰山，观易姓而王，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，不可得而数者万数也。”这样看起来，到了春秋时代，文字已经过多次变化了。不然，在七十二家中，管仲怎会只识十有二呢，在万数中，孔子怎会只识七十余呢！可以证明，文字到了管、孔的时代，已经过多次的变化。假使只变化一二次，就不会距离得太远的。从这些情况看，我国之有文字，当在甲骨、钟鼎之前。

文字是广大人民经过长久的时间创造出来的，其初当然很少，以后乃“孳乳而寖多”，不是仓颉一人所造的，若有仓颉其人的话，也不过对于文字有整理统一的功劳。《易经》上说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《易系辞传》也说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，易之以书契。”这两个文献上，并没有说是仓颉造的。古代的圣人，也就是劳动人民，有些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名号，象有巢氏、燧人氏，可能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名字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上说：“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一也。”意思是说仓颉专研文字学，有整理文字的功勋。以后史籀造大篆，李斯造小篆，程邈造隶书，王次仲造楷书，

都不过是做整理文字的工作，不是他们造的。且李斯整理出来的小篆，是用秦国简化大篆的文字，而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，可见小篆不是李斯造的了。再说，文字若是由一个人来创造，则文字也不会有异体、奇字了。以今证古，现代的简化文字，也是人民大众造的，然后由政府来整理统一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而且，创造文字的，不一定是文字学专家，而整理文字的才属于文字学专家。所以，创造文字的是劳动大众，改革文字的仍然是劳动大众。过去的统治阶级，对使用文字往往是保守的。隶书产生于周代，到秦代已大行，但刻石仍用小篆；汉朝已用楷书，但刻石仍用隶书。汉代有章草，是用隶书的笔法；有今草，是用楷书的笔法，楷书不是相当成熟，是不会用楷书笔法的今草的。这可以说说明新兴的字体——秦代隶书，汉代楷书——统治阶级却认为是俗体，不足以登“大雅之堂”，所以不用于“高文典册”。等到人民大众使用久了，统治阶级才不得不采用。

文字是应用的东西，本无意求其美观，但书写的工具是毛做的笔，毛有弹性，变化大，笔画可长可短，可肥可瘦，可干可润，可方可圆，可大可小，且可长短、肥瘦、干润、方圆、大小错综用之，变化既多，乃觉美妙，而书法也就随之而产生，且发展而为书学，书法遂成为我国独有的艺术。日本、朝鲜、越南，也有书法，是在唐朝的时候，从我国传去的。

古代无所谓书家，古代书家都是后人尊崇出来的。直到晋朝，才尊重二王等人的书法，推为书家，但在同时代的北朝，仍不见得重视书家。象郑道昭，书法的成就那么高，但他在《郑文公碑》上并不特别提出他的书法。《郑文公上碑》上只说：“季子道昭，博学明佛，才冠秘颖，研图注篆。”“注篆”与书法还有些关系。但在“上碑”上则只说“研图注史”，反与书法无关了。可见在北朝是不那么重视书家的地位的。

书法是随文字的改革而转变的。改革文字的既属于人民大

众，则随文字而转变的书法，也是人民大众改造的了。汉末蔡邕创造“飞白书”，是见到建筑工人用墨帚写大字而学来的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一 商朝以前的书法

在石器时代，我国已有文字，是不须怀疑的。我国写字用毛做的笔，所以字多变化而呈奇观。可能其初是用毛蘸兽血来写的，后来又用漆，漆是相当浓的液体，致笔画象蝌蚪，所以叫蝌蚪文。毛笔有弹性，笔画变化大，于无意中写出美妙的文字。史前情况，没有实据，只有传说。相传神农见嘉禾八穗而作穗书，黄帝见景云而作云书，少昊作鸾凤书，帝尧作龟书，都有求美之意。郑樵《通志》载仓颉《石室记》有二十八字，在仓颉北海墓中，土人叫做藏书室，周代没有人看得懂，到秦朝李斯才认识八个字，是“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”。汉初叔孙通，认出十二个字。这些说法都没有实据，只能姑妄听之。

我国可靠的历史，是从商代始，夏朝至今尚没有发现实物流传，仍属传说时代。陈思《书小史》上说：“禹因九牧黄金，铸鼎象物，故作钟鼎书。”但是鼎没有了，字也不可考了。而事则屡见于《左传》，其时鼎尚未失。当非虚构。夏代钟鼎没有可靠的，衡山岣嵝峰，原有《神禹碑》，人叫《岣嵝碑》，有七十八字，说是夏禹刻的，虽然唐代韩愈、刘禹锡有诗歌咏其事，殊不足信。且原石无存，明代杨慎摹其字加释文刻石，但字和大篆相距太远，不可识别。冯云鹏《金石索》尚有“出令羲子星纪齐春其尚乙巳”十二字，乃是从《汝帖》、《绛帖》摹来的，字近大篆，不知是从那里来的。杨慎的《金石古文》也载庐山紫霄峰石穴中，有禹刻七十余字，可以认识的有“鸿荒漾余乃擗”六字，其余就不可识了，但这都是难以置信的。

二 商朝的书法

文字到了商代已有很大发展，可以见到的是甲骨文。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，该地是商朝后期的首都，前后出土大小块在十万以上，可惜在旧社会里任人购运，多为外国人捆载而去。甲骨文的发现，对于研究古史，研究书法，都是一大宝库。据专家研究，甲骨文是先书后刻的，于刻漏处，尚可见到朱书与墨书。甲骨文小如蝇头。可见毛笔的制造，已很精良了。关于骨甲文的专书，有《铁云藏龟》等好几十种。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容媛《金石书录目》，所收已有四十五种。

商代钟鼎，以时代较远，流传无多。宋薛尚功的《历代钟鼎彝器法帖》二十卷，书刻于绍兴十四年，所收虽有夏器二、商器二百零九、周器二百五十三、秦器五、汉器四十二。评者说，夏器全不可靠，商器也多为周器。张抡的《绍兴内府古器评》所载商器七十七、周器九十。张廷济的《清仪阁集古款识》，陈介祺的《东武刘氏款识》，钱坫的《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》，容庚的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等书所收也寥寥无几。商器未尽有字，即有多只几个字，十字以上的已少见了。一般人认为有十干名号的为商器，但《绍兴内府古器评》说：“世人但知十干为商号，遇款识有十干者皆归之商，误矣！如周召公尊曰：‘王大召公之族，作父乙尊彝’，而谓之商器，可乎？盖父者，所以尊称，乙者，乃其名耳。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，得之子曰癸公兹母，然则此言‘父乙’者，岂癸公为其家庙而作耶！”这样看来，遇到有十干名的器，又当审慎鉴定，勿孟浪认为商器！

三 周朝的书法

到了周代，钟鼎文的制作又大有精进，铭文也渐长，不象商朝

的简短了。铭文的位置，或在外面，或在里面，或在边缘，或在器底，没有一定的位置。铭文最长的，首推“毛公鼎”，文长四百九十七字。“散氏盘”文长三百五十七字，字多完好。吴玉搢的《金石存》称之为“乙卯鼎”，因为铭文有“辰在乙卯”之句。钱大昕的《潜研堂金石跋尾》称之为“西官盘”，以文中“西官”二字凡三见。至“散氏盘”的名称，是始于阮元的。周器铭文达二三百字的不少，百字、百字以下的则更多了。这些文字大致都是朴拙、雄健、浑厚的，学钟鼎文，要向这个目标努力，才不白费功夫。因为古代书法，没有薄弱纤巧的。

周代书法之可见的，除钟鼎外，尚有刻石，欧阳修《集古录》载周穆王刻石有“吉日癸巳”四字，在赞皇山上。据《穆天子传》，但云登山，不云刻石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也是一样记载。但字纯为小篆，笔画虽劲，不是西周文字，是不可靠的。“延陵季子墓碑”，说是孔子书的，文为“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，虽是大篆，但也难置信。最后应该谈到“石鼓文”了。唐宋学者多认为“石鼓文”系太史籀所作，金人马定国乃专从“石鼓”字画研究，认为是宇文周时物。“石鼓文”为大篆到小篆过渡的文字，是很明显的。近人多认为是先秦的石刻，都言之有理。时代虽小有出入，但大致都和太史籀同时代。关于“石鼓文”的著作，有二十种之多。康氏《广艺舟双楫》说：“石鼓文”如金钿落地，芝草团云，不烦整裁，自有奇采。”“石鼓文”既为我国最古的石刻，而字势雄健，结构天成，当为书法无上瑰宝了。鼓数有十，其一已成没字碑，今拓尚有二百四十多字。还有“秦诏楚文”，计三百四十八字，虽笔势稍弱，而神韵独妙，当非赝品。

此外周文王史佚撰鸟书，又随武王观兵孟津，渡河中流，白鱼跃入舟中，因作鱼书，又因鵞虞作虎书，又作回鸾篆。宋司马作转宿篆，象莲花未开形。鲁秋胡妻因浣蚕，作虫书，文献虽不足徵，也算一种传说。

四 秦朝的书法

秦朝祚短，始皇统一天下，称始皇帝，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，到子婴出降，只有十四年，但这个时期，仍有一二书家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首先要谈到李斯，斯、上蔡人，秦丞相，相传是小篆的创造者，其实是把秦国简化大篆的小篆整理划一而颁布之，且著有《仓颉篇》，而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。古史上说他精于大篆，相传秦代有《泰山》、《峄山》、《之罘》、《琅琊台》、《碣石》、《会稽》几处刻石，据说都是他写的。现在所见到的，只有《泰山刻石》十个字，《琅琊台》已模糊不清，《峄山》、《会稽》，只有后人临本刻石。同时尚有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都是关于文字学的著作，传说他们都能书。还有程邈，也精大篆，曾整理隶书得三千字而献于始皇。秦代小篆，尚有度量上的文字，其文是：

“廿六年，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号为皇帝。

乃诏丞相状，绾法度量则，不一，歉疑者，皆明一之。”

这些字刻在铜版上，有些弯，象桥形，四角都有孔，以便钉于器上。这是秦始皇称皇帝的那年，命令丞相隗状、王绾统一天下度量而颁布的诏版。这些字比上面所举的刻石好得多，书势雄健，变化大，精神旺盛。天下权量甚多，当然不是由大臣来写，可能是经管该部门的小吏写的。

五 汉朝的书法

文字从商朝到汉朝，已经过多次的改革了。这个改革，是从难写到易写，笔画从繁到简——隶书比篆书易写，楷书比隶书易写，行书比楷书易写。晋丘衍在他的《学古编》上载有七种：一、科斗文，二、籀文，三、小篆，四、秦篆，五、八分，六、汉隶，七、款识。其实楷

书、行书、草书，在汉代都已通行。汉代章草是用隶法，今草是用楷法，可见楷书在汉朝通行已久。在西汉新莽时，又增减而为六种：一为古文，就是蝌蚪文和籀文（大篆）；二为奇字，就是古文的别体；三为篆书，就是小篆；四为左书，就是佐书，佐是助的意思，也叫隶书，隶书笔画简省，书写便捷，可以助篆书的不及，是狱吏管徒隶事用的；五为缪篆，就是刻印章的文字，蟠曲以求方正圆满，这些文字多用小篆；六是鸟虫书，笔画作鸟虫形的篆书。但我国的书体，细分起来，尚不止此。梁朝庾元威曾经代人写过百体书，那当然有些牵强的地方。汉代通用的字体，也有七种：一为小篆，是碑额、砖瓦、印章上常用的字；二为分书，没有挑法，象《鲁孝王石刻》便是；三为隶书，是东汉刻石普通用的文字；四为楷书，除统治集团外，一般人民都已通用；五为章草，是用隶法写的草书，结构章法，相当整齐；六为今草，就是现在一般草书；七为行书，因为草书过于放纵，号为狂草，不易辨认，而楷书又不能写得快，所以又创此体。文字到了汉代，无体不备，以后就不再有增加了。

书法在汉代可以说是黄金时代，因为篆书汉代尚常用，隶书为通行字体，而章草、今草、行书、楷书也成熟于这一代。汉代书法，当然是包括新莽的十四年（公元九年到二十二年），淮南王（更始帝刘玄）的二年（公元二三到二四年）在内，是公元前二〇六年——公元二二〇年四百二十六年间的书法。

汉代小篆，流传到现在的，以砖瓦为多，象“长生未央”、“与天无极”、“长生无极”等，砖当更多。西汉石刻较少，有篆书“赵廿二年群臣上寿刻石”及《鲁孝王刻石》有“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”十三字。还有阮元于扬州甘泉山惠照寺乱石中所得的三石，其一漫灭无字，其一有“中殿第廿”四字，其一有“第百卅”三字，阮元认为是西汉之物。陶宗仪《古刻丛钞》摹刻“汉建平鄣县石刻”，字大六七寸，计二十九字，《金石索》也认为是西汉之物。西汉石刻寥寥如此，难怪欧阳修不载，而赵明诚《金石录》，也只收建元二

年郑三益一阙。叶昌炽《语石》上且说，刘聪、苻坚，都以建元纪年，尚未能信为真的。宋尤袤《砚北杂记》说：

“西汉石刻文，自昔好古之士，固尝博采，竟不之见，闻自新莽恶称汉德，凡有石刻，皆令仆而礧之，仍严其禁。”

这一说法或者可靠。不过刻石始于周末，东汉后期最多，则西汉数量也应少。现在看汉碑上的刻石年月，建和、永寿、延熹，是桓帝刘志时年号；建宁、熹平、光和、中平，是灵帝刘宏的年号；初平、建安，是献帝刘协的年号，在汉碑中，是最常见的。

汉碑，自来金石著录至多只有三百种，拙编《汉碑录》（《汉代书学及汉碑》的一部分）是从书本上发掘的，得七百多种，石存的也在一百七十种以上。篆书，在新莽时有《况其卿坟坛》、《上谷府卿坟坛》东汉有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嵩山少室神道石阙铭》、《嵩山开母庙石阙铭》，都是小篆，刻于安帝时。汉碑额用小篆的也不少，也很美妙。《汉中太守都君开通褒斜谷道碑》，刻于明帝永平六年，画细而气势雄厚。《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书在篆隶之间。《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》变化大，势雄丽，是汉碑的上品，刻于建和二年。《杨淮表纪》近《石门颂》而雄肆过之，是隶中之草体。《荡阴令张迁碑》浑劲朴茂，也是汉碑的精品，刻于中平三年。其他佳碑尚不少，象《西狭颂》、《郙阁颂》、《夏承》、《孔宙》、《安阳残碑》六石也很好，其中《正直》、《子游》尤妙。四川有《沈君阙》、《冯君阙》，也是画细而势雄厚的。《曹全碑》则秀极，似不宜于初学，恐入直滑之途。其余《礼器》、《史晨》、《乙瑛》，是孔庙中碑，章法未免偏于拘谨。汉末尚有《熹平石经》，可惜所存无几了。

汉代金文，据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所载，有齐《安铲铭》、《孝成鼎铭》、《元延𫓶铭》、《承安宫鼎铭》、《建昭雁足镫款》、《杜陵壶铭》等。

尤不能不一谈的，是汉代竹简、木札上的墨迹，最近还有发现，书多草隶，间也有些今草，比刻石的字，又更可宝了。

汉代帝后帝室诸王，都有爱书法者，西汉有武帝刘彻、元帝刘

夷、许后，东汉有光武帝刘秀、章帝刘炟、安帝刘佑、灵帝刘宏、章德窦皇后、和帝阴皇后、和熹邓皇后、顺烈梁皇后、北海敬王睦、乐成靖王党，都见于《汉书》。

臣民中能书者，有萧何、司马相如、张安世、严延年、张敞、杜邺、李长、爰礼、孔安国、李陵、张彭祖、史游、王尊、陈遵、谷永、扬雄，都是其著者。

东汉有王次仲，相传他创造楷书，殆是整理文字有功的缘故。史学家班固、名将徐幹、文字学家许慎，史上都说其善书。杜度为草圣、崔瑗、张芝都是以草书名者。此外尚有杜林善写古文，刘德升是行书的创造者，当也是有整理之功。其他苏班、左伯、罗晖、赵羲、张超、孙敬、王绮、唐综等，都见于《书断》和《书小史》。汉末书家，以蔡邕为最著名，见工人以墨帚写大字而创飞白书，著有《笔论》、《书说》。其女文姬，也善书，曾述其“笔势”说、“疾涩”论，于后代书法影响很大。

六 三国的书法

三国鼎立，是一个四十余年不统一的局面，戎马仓皇，影响到文化艺术。但是继承了汉代的洪流，书家仍然辈出，曹魏最盛，孙吴次之，刘蜀未免有逊色了。

曹魏书家有梁鹄、邯郸淳、卫觊、钟繇、钟会等，太祖曹操、文帝曹丕，也是能书的。孙吴有皇象、刘纂、岑伯然、张昭等，大帝孙权也是善书者。刘蜀则只有诸葛亮以书名。曹魏碑有《受禅表》、《上尊号》、《孔羡》、《范式》、《王基》、《曹真》，都很著名，但远不如“李苞开阁道”之雄健生动，此刻殆是开路工人的作品。孙吴刻石，相传是皇象写的《天发神谶碑》，苏建写的《禅国山碑》，雄强无敌，非曹魏诸碑所可比肩，尚有楷书《谷朗碑》、《葛府君碑额》都很好。刘蜀虽说诸葛亮善书篆、隶、八分，然遗迹不可得而见，只于《阁帖》中有“玄

莫大寂，混合阴阳”八字，张飞是西蜀的大将，不以书名，但有《刁斗铭》，又有流江县《纪功题名》，有：“汉将军飞，率精卒万人，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漾，立马勒铭。”共二十二字，字为隶体，大三四寸。我所藏的虽为翻刻，尚可见其雄健可爱，文也极精练可取。西蜀没有书家，当是张飞的笔迹无疑。陆游对于学诗，有“功夫在诗外”之句，则非诗家未必无佳作，《诗经》的《风》，多是劳动人民的作品，则书法也一样，一般非书家的作品，未必在一生致力于书法者之下。

七 晋朝的书法

晋朝的书法，以距汉代不远，名山的刻石犹新，书家的墨迹尚在，况时尚清谈，不少知识分子淡于利禄，竹林七贤，就是其代表。惜晋代沿曹魏之旧，也禁立碑，所以刻石极少。晋代也有“石经”之刻，见顾炎武的《石经考》，但是片石无存了。晋代石刻，寥寥可数，《孙夫人》、《太公吕望》两碑是著名的隶书碑，但浑厚就难与汉碑比了。此外尚有《南乡太守郭休碑》、《爨宝子碑》、《枳杨府君神道》、《司马韬墓志》、《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碑》、《永嘉残石》、及《郭巨石室泰山高全明题名》等，近在南京附近也出土些墓志，但南朝墓志是不多的。王献之的《保母志》是很著名的。摩崖刻石，为《潘宗伯造桥题字》，恐是造桥工人的法书，和曹魏的《李苞开阁道碑》刻在一起，拓者每拓为一纸，此刻在右，书风相近，雄健朴茂，变化很大，应是晋代石刻第一。尚有砖瓦文字，其数也不少，晋简也有，且是墨书，是晋人的真迹，更是可贵。

晋代皇帝及帝室，也有能书者，西晋有景帝司马师、文帝司马昭、武帝司马炎、武元杨后、齐献王攸，都见于《晋书》、《书小史》。东晋也有元帝司马睿、明帝司马绍、成帝司马衍、康帝司马岳、哀帝司马丕、简文帝司马昱等，都见于《书小史》、《述书赋》。

西晋书家有何曾、荀勗、杨肇，草隶兼善。竹林七贤都善行草

书，见于《述书赋》。卫家是以书显的，其先是卫觊，觊子瓘，瓘子恒，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书家。恒的从妹卫夫人更是著名的女书家，王羲之少时，是拜她为师的。卫夫人名铄，字茂漪，李矩妻。著名的书家尚有索靖，是汉代大书家张芝的离孙（他姐姐的孙子），又得韦诞笔法，所以精于章草及草书，有《出师颂》、《月仪帖》流传下来。此外尚有著名的学者、文学家而善书的，有羊祐、张华、傅玄、吕忱、杜预、左思、陆机、张翰等，都见于《书小史》。

东晋书家也很多，而以王、谢、郗、庾四家族为最盛。王家当然以王羲之、献之二王为最著名，但现在能见到的，羲之只有小楷、行书、草书，章草就不多了。献之也是小楷、行书、草书，羲之以小楷《黄庭经》、行书《兰亭序》为最著名，献之以《洛神赋十三行》为最著名，他们尚有些墨迹流传，恐都是摹本、临本，不大可靠。所传不过这些，但他们所学当不止这些字体。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说：

“羲之少学卫夫人书，将谓大能。及后渡江，北游名山，比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；又之许，见钟繇、梁鹄书；又之洛，见蔡邕《石经》书；又于从兄洽处，见张昶《华岳碑》，始知学卫夫人书，徒费岁月耳。羲之遂改本师，仍于众碑学习，遂成书耳。”

他于渡江后所见的书，李斯、曹喜是篆书，钟繇、梁鹄是楷书或隶书。《石经》、《华岳碑》是隶书，我们对于古代书家，不能以不见到的书体，就说他不会写，取材不博，是不会有什么大成就的。据朱杰勤的《王羲之评传》中的《羲之帖目》所列，也在二百种以上，现在要看，只好从《阁帖》上找，墨迹虽不可靠，也有《丧乱》、《游目》、《奉橘》、《二谢》、《快雪时晴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十七日报》、《频有哀祸》等，王献之也有《中秋帖》、《送梨帖》、《鸭头丸》等，虽不可靠，殆也近似，仍然可以看看的。羲之的长辈也多能书，如王敦、王导等，兄弟子弟侄行也有能书的，如王恬、王洽、王劭等，羲之的儿子，献之外，尚有凝之、徽之等也均能书。

谢家能书的有谢尚、谢奕（安兄）、谢安、谢万（安弟）、谢藻、谢

敷、《述书赋》上说：“谢氏三昆（尚、奕、安），尚草特峻，犹注飞润之瀑溜，投全牛之虚刃。”孙过庭《书谱》上也说“谢安素善尺牍”。

郗家能书的有郗鉴（羲之岳父），《书断》称其“草书卓绝”。郗愔（鉴子）、郗昙（鉴子）、郗超（愔子）、郗俭（昙子）、郗恢（俭子），都见于《书断》、《述书赋》、《书品》、《书小史》等书。

庾家能书的有庾亮、庾翼（亮弟）等，都见于《书小史》、《述书赋》、《书断》等书。而翼名最著，《书断》说其“名亚右军，为世所重”。

四家之外，尚有不少著名书家，象陶侃、刘超、顾荣、任靖、卞壶、应詹、葛洪、刘惔、范汪、范宁、孔愉、丁潭、刘廩、张澄、张彭祖、荀爽、刘劭、张翼、康昕、惠式道人、刘璞、刘怀之、韦昶、沈嘉、桓温、桓玄、顾恺之、诸葛长民、袁山松、陈畅、卢谌、虞安吉等，真是举不胜举，晋代是书家最盛的时代。

女子能书者除卫夫人之外，尚有郗夫人（王羲之妻）、谢夫人道韫（王凝之妻）、傅夫人（郗愔妻）、李如意（王献之保母）。都见于《书品》、《书小史》等书。

尚要提一下的，米芾《海岳名言》说：“葛洪天台之观飞白，为大字之冠，古今第一。”《书小史》于张翼说：“时穆帝令翼写‘右军手表’，帝自批后，右军殆不能别，久乃悟云：‘小人几欲乱真！’”《宣和书谱》说：“翼正书学钟繇，草书学羲之，皆极精妙。”顾恺之是历史上著名画家。《书小史》上说：“长康（恺之别字）善书，图写特妙，谢安深重之，谓有苍生以来，未之有也。时人号为三绝：谓痴、画、书也。”

八 南北朝的书法

从西晋东迁，南北之局势已定。刘裕继晋，统御南方，国号叫宋，拓拔珪灭十六国，雄据北方，国号叫魏。南朝自宋而齐而梁而陈；北魏百余年后，也分为东魏、西魏，又亡于齐周，到了隋朝，才统一南北。南朝到齐，还禁立碑，梁、陈虽宽其禁，而习俗已成，刻石仍

少。叶昌炽的《语石》上关于南朝一则，引钱大昕的话说：“相传明祖营治都城，尽辇碑石为街道，为所毁无疑。呜呼！此亦斯文之浩劫已！”再看严观的《江宁金石待访目》，这说是可信的。南朝碑刻既少，法书多靠《阁帖》以传，枣木传刻，多不可恃，学书应以碑刻为贵。东晋书学极盛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当受其影响。南朝刻石既少，现在可见到的，云南有宋《爨龙颜碑》，江苏焦山有《瘗鹤铭》，南京附近，有萧梁陵墓石阙十余种，《太祖文皇帝神道》，楷书近尺，尤为雄伟。贝义渊写的《始兴忠武王碑》，尚有千余字完好。梁《天监井栏题字》有两个，一为隶体，一象《瘗鹤铭》，殆是陶宏景的笔迹。此外尚有《绵州造像》五种，字虽不多，仍是可宝的。

刘宋能书的：武帝刘裕、文帝刘义隆、孝武帝刘骏等，都是帝室能书者。臣民中有刘穆之。王昙首（僧虔父）、王裕之、羊欣、孔琳之、谢灵运、范晔、谢综、王思玄、裴松之等。其中以羊欣为最著名，他是献之的外甥，时人说：“买王得羊，不失所望”。张永善隶书、行书，尝对文帝说：“臣恨二王不得臣体。”谢综每不重羊欣书，欣亦怕他，可见其不凡。

齐代能书的：高帝萧道成、武帝萧赜、废帝萧昭业、武陵昭王萧晔等，都是帝室能书者。臣民有王僧虔、王慈（僧虔子）、王志（慈弟）、王晏、褚渊、褚贵（渊子）、顾宝光等。其中王僧虔书名最著。高帝尝与僧虔赌书，曰：“谁为第一？”对曰：“臣书，臣中第一；陛下书，帝中第一。”

梁代能书的：武帝萧衍、简文帝萧纲、武德郗皇后，邵陵王萧纶，是帝室中能书的。臣民能书的，有萧子云、萧特（子云子）、萧确、王彬、王筠（僧虔孙）、王僧孺、沈约、袁昂、庾元威、庾肩吾等。其中武帝萧衍，很好书法，尝与陶宏景论书，书有四通，宏景有五通。尚有《观钟繇书十二意》及《书评》。萧子云是很著名的书家，有章草《出师颂》流传。袁昂有《古今书评》流传、庾元威也有《论书》流传。又为人书十牒屏风，作百体书。庾肩吾有《书品论》，把以往书人分